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及其他

——张琢同志“九死一生”理论初探

刘 崇 顺

8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运动所作研究和著述甚多,张琢同志新近面世的学术专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①(以下简称《九死一生》),是其中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

《九死一生》把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酝酿、发展及其曲折坎坷的历史进程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深远背景下加以考察,视角独特、视野广阔,具有恢弘的气势和整体观照的效果。张琢同志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所作的“九死一生”的高度概括,堪称自成一家之言,不妨名之为“九死一生”理论。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走向和曲折遭遇,蕴含着许多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

一种新的有价值的理论,除了它自身的价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能启发人们新的思路。通览张琢同志的大作,感到其中有一些需要深入探讨或进一步廓清的问题,这里提出几点,就教于张琢同志和学术界的朋友。

一、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历史必然性

“九死一生”理论在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理性思考之中,包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机遇多次丧失的痛惜之情。这种痛惜之情是许多学者和爱国志士所共有的。这种痛惜之情的潜台词是:中国本来早就可以走上现代化的振兴之路的,只是因为抓住了“天赐良机”,才使国家民族积贫渐弱,落后于人。由此生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无限感慨。这种感慨显然是把丧失机遇归因于主体意志及主体的动机、观念、心态等等主观因素。

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九死一生”理论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及其曲折进程所作的许多精辟分析,恰恰说明了这种历史必然性。例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地域转移(空间断层)和历史阻隔(时间断层),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点等等,无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现代化运动屡遭挫折、屡难启动的内在原因。至于“重本抑末”观念长期而又广泛的影响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关禁海政策对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等等(第109—123页),当然都是延缓现代化启动日程的重要原因,但是,“重本抑末”观念也好、封关禁海政策也好,不正是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所派生的么?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内在因素的作用,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与西方先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整体上显示出难以为任何主观性设想所能左右的滞后性。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

^① 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文及下文凡引此书,皆只夹注页码——编者注。

一度有过若干超前性表现，但那往往是一种个别的或局部的、暂时的或分散的现象。偶然的
历史机遇不能与总体上的历史必然性相提并论，决定历史发展总的进程的本质因素是一个基
本规定或一种客观的设定，它不会为一些个别的、偶然的因素所改变，也不是主观意志所能
任意左右的。由于历史必然性的本质规定，不要说有九次机遇，即令是有十九次、二十九次、
九十九次，也未必就能够被“抓住”。

诚然，主体的意志、观念文化上的因素，也会影响现代化的进程。《九死一生》指出的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九次大起大落，无疑都有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但这些主观因素
仍然是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仅就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末中国所丧失的发展机
遇或所遭遇的严重挫折而言，“三面红旗”运动和“文革”内乱的决策失误似乎是具有决定
意义的，但这种失误和导致失误的主观因素同样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不成熟的思想根源于
不发达的经济土壤，表现了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延续性。建国以来，中国所实行的计
划经济体制，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形似超前实则滞后的军事共产主义经济的特点，单一公有制
的基础仍然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由此只能产生出“一大二公”、圣贤崇拜、幼稚狂热之类的
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在那种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条件下，领导人的政策失误和
全体国民的心理反常都是必不可免的。

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潜伏着断送新的历史机遇的主观因素。今日中
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显示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除了国际环境的作用影
响，主要是中国社会发展自身历史条件的积累，屡次曲折与坎坷、一切挫折和失败，都是一
种积累，一种准备。只有具备了足够的积累，形成了特定的发展条件，现代化运动才可能达
到合历史规律性与合主体目的性的统一。今天的历史机遇在总体上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这与
历史上的许多次发展机遇看来相似，实则不同，因而不能相提并论。

二、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潜要素

《九死一生》中有个重要概念，即“现代化发展的潜要素”，作者将其视为“现代化发
展的前提条件”的同义语。按我的理解，这个概念表述的应该是现代化孕育期所能形成的直
接影响现代化启动即成为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直接动力的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心
理诸要素及其有机组合。就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而言，现代化的孕育期应该是与资本主义
的产生和早期发展（工业革命以前）同步的。正如作者在《九死一生》中所认定的：“现代化
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开始应用机器生产的时候才出现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的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第41—42页）作者认定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于宋元之际，那么，中
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或潜要素”的形成不会早于宋元之际，但作者实际上把这种“前提条
件或潜要素”的形成一直上溯到战国时代。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因素和“作为现代
化发展前提条件的潜要素”之间的异同。在作者看来，“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以一定的科技、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为条件。但是，作为现代化启动、发展的前提条件的潜要素并
非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创造发明，也是以后
传入西方启动资本主义发展及尔后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科技因素，可是它们自身并不具有资
本主义的特定属性。”（第41页）我则以为，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因素与现代化发展的前提
条件或潜要素之间有无区别、有何异同，问题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社
会、经济、科技、文化的某些发展成就，即使达到高度的水平，也不能成为启动现代化的直接

因素，原因就在于这些成就还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些单一要素，没有实现诸种要素的结合。这些社会、经济、科技、文化诸要素的结合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把历史上某些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单一要素笼统地界定为现代化的潜要素，而不把它们在具体形态上加以区别，这正是把现代化孕育期时限不适当地上溯的重要原因。

单一的社会发展要素不足以构成现代化发展的直接条件，是因为这些单一要素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个别现象。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径情直遂的，既有连续的常态发展，又有跳跃式的非常态发展，这正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表现。马克思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曾以古希腊荷马史诗等艺术生产的超历史的高度发展，说明早在人类幼年时期的某些文化艺术成就即已达到了超时代的水准，以至成为以后各个时代高不可及的范本。但这种高度发展的艺术成就，并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标志，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时代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经济结构。历史上某些科学技术等社会发展的重要成就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与人类幼年某些早熟的艺术成就也有类似之处。当这些科学技术发明尚未在社会生产上广泛采用从而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当这些发明尚未能与其他诸种社会要素相结合而对整个社会发展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规模效益，它们就不能构成直接作用于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或潜要素。只有诸种单一要素的有机结合构成特定的生产方式或整体系统，才可能成为直接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由此推论，对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或潜要素的确认，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形态背景。尽管“作为现代化启动、发展的前提条件的潜要素并非一定是资本主义的”，但是，这种前提条件的形成，必定具有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世界背景。

此外，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学术界通常认为应在明代末期。这一观点虽不能说是定论，但至少是早已形成了广泛共识的。本文寥寥，对此不能详加论列。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可以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限上溯到宋元之际的话，也就可以上溯到唐代、汉代以至战国时代。如果说上溯到汉唐时代不妥，那么，上溯到宋元之际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足够根据。

三、关于西方与中国现代化特点的比较

“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受到强烈的外铄影响，但它又是以中国自在的地理环境、中国各方面的历史积累为基础而展开的。”（第1页）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历史条件、内在原因，“九死一生”理论作出了富有开创性而又令人折服的解释。例如，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农业社会内在矛盾形成的内外周期与自然周期的叠加及其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中国封建社会演进大周期的规律，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宏观与微观双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形成的长期影响，这些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又极富说服力。如果进一步探究中国资本主义难以萌生、现代化难以启动的原因，似可归结为中国秦代以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和汉代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如果把中国与欧洲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区位迁移与整个欧洲的经济文化区位迁移有某些相似之处，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是可以得到同步发展的。但是，欧洲的经济文化发展虽然几经转移，却始终没有断层，而且，先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总会影响和带动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而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自古以来就很不平衡，但由于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牵制了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后进地区每每拖了先进地区的后腿，使得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多次出现由空间的断层又导致时间

的断层，在总体上呈现出时空双维的间断，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发展要寻找空隙而不可得。而欧洲的政治实体众多，没有可与中国相比的那样控制着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所以资本主义在欧洲不难找到适宜于自己生长的环境和土壤，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有转移，在总体上却不曾中断，“由南欧，而西欧，而北欧，而中欧、东欧，向西越过大西洋扩展到美洲，向东则沿印度洋、太平洋的海岸推进到东亚”。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封建大一统王国，终究难以仅仅凭借自身的内在机制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欧洲相同步，最终不能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猛烈冲击的对象，这正是外铄性或“后发—外生型”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主要特征的重要原因。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唐军

湖北省医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召开

湖北省医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暨首届学术讨论会1993年6月3日至5日在武汉市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社会学界和医学界的科研、教学、管理和实际工作者共计86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2篇，其中有28篇论文在大会上宣读。论文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德医风建设问题、医师与病人关系的社会文化观、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医学的联系与区别、三峡工程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精神医学的社会问题、生殖医学、器官移植学、儿少卫生、妇幼卫生学中的社会问题、安乐死问题以及性病传播的社会控制。由周浩礼教授、胡继春副教授主编的30余万字的《医学社会学》（已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会上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

最后，会议经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医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首届理事会。

（闻 喆）